

中心视角与边缘地带

——英国学派的非殖民化研究

孙启龙

内容提要 英国学派将非殖民化置于国际社会理论体系中考察,认为非殖民化是帝国正当性丧失和主权国家规范确立的过程,标志着西方殖民式国际社会向全球性国际社会的转型,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同时,英国学派强调非殖民促进了全球国际社会的文化多元化,削弱了欧洲国际社会,使全球国际社会的根基较为薄弱。因而,英国学派的非殖民化研究体现出一种强烈的中心—边缘倾向。一方面,英国学派尝试从国际社会视角对边缘国家的非殖民化进程展开探讨,关注非殖民化与国际秩序和正义之间的关系,希望消除全球国际社会的等级制和不公平,但对非西方国家历史和施动性的忽略,导致其又陷入中心主义的矛盾中;另一方面,基于欧洲国际社会全球扩展的逻辑论述非殖民化,英国学派将“失败国家”和“脆弱国家”的出现归因于非殖民化,更加剧了英国学派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因此,在英国学派非殖民化研究中,不断交错着中心与边缘的矛盾与张力。

* 孙启龙,吉林大学世界史系博士。(邮编:130012)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规律与国际秩序演进研究”(项目编号:22VLS015)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国际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3VLS031)阶段性成果。感谢《国际政治研究》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 非殖民化 英国学派 国际社会 边缘地带

21世纪以来,西方的相对衰落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与分化构成当今世界的图景,对当今国际秩序提出挑战,如何理解全球南方国家自身的形成与演变,以及他们对国际秩序的诉求是关系到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议题,非殖民化研究为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思路。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国内学者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进程,但受限于资料和官方指导思想,将其称之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强调殖民地人民与民族主义在这一过程中的主导作用。^①自20世纪90年代起,学界开始对非殖民化概念、起因与进程等议题进行探究。^②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英国、法国等殖民帝国的解体,以及美国与苏联等大国的促进作用及多重动因,这其中,对英国的非殖民化研究最为丰富。但国内非殖民化研究多为历史学路径,关注非殖民化的起因与过程,从理论和现实结合层面探索非殖民化的意义方面则相对薄弱。

国外学者对非殖民化的研究则通过对历史档案的解读与分析,论述以英国、法国为代表的殖民帝国非殖民化过程,试图还原帝国从殖民地撤出和殖民国家独立过程和原因。他们认为,非殖民化原因在于帝国的衰落和世界政治形势的转变。^③部分学者强调帝国主动撤出的意愿,认为从正式统治向非正式统治的过渡有利于维持世界大国的身份,^④或强调非殖民化是帝国政治转型不可避免的结果。^⑤在他们看来,非殖民化是帝国衰落和权力转移的过程。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卡尔·哈克(Karl Hack)甚至直言:“帝国主义和全球化本身就

① 张顺洪:《论英国的非殖民化》,《世界历史》1996年第6期,第2—10页。

② 李安山:《论“非殖民化”:一个概念的缘起与演变》,《世界历史》1998年第4期,第2—13页。张顺洪:《大英帝国的瓦解:英国的非殖民化与香港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孙建党:《美国20世纪非殖民化政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

③ Henri Grimal, *Decolonization: the British, French, Dutch and Belgian Empires, 1919-1963*, Colo: Westview Press, 1978; R. F. Holland, *European Decolonization 1918-1981: An Introductory Surve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85.

④ John Darwin, *Britain and Decolonisation, The Retreat from Empire in the Post-war World*,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1988, pp. 334-335.

⑤ A. N. Porter and A. J. Stockwell, *British Imperial Policy and Decolonization, 1938-64, Volume 1*, 1938-51,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87, pp. 5-6.

是非殖民化的根源。”^①因而其叙事方式和风格也多展现出浓烈的“帝国”风格，与新独立国家对历史的叙述呈现一种二元对立。^②但对历史的过度关注，使非殖民化被“束缚”在史料的分析与整理中，难以观察到非殖民化的影响以及更深层次的意义。部分研究者将非殖民化置于西方的学科体系中考察。以哈佛大学艾默生教授(Rupert Emerson)为代表的国际关系学与政治学者强调非殖民化是西方民族国家模式与规范传播的结果，殖民统治塑造了反殖民族主义、^③对民主的认同及西化的精英群体。因而，非殖民化也被视为国家构建和政治模式传播的过程。^④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蔡斯·邓恩(Christopher Chase-Dunn)和理查德·鲁滨逊(Richard Rubinson)教授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者则认为非殖民化与世界经济体系紧密相关，经济霸权的存在和世界经济的扩张，推动了非殖民化的发展。^⑤

上述研究为理解非殖民化提供了重要参考，但也存在一些不足，表现为注重对非殖民化历史进程的梳理，或仅从制度、规范以及世界经济体系的层面理解非殖民化的影响，难以解释非西方世界与国际秩序之间的互动。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流派，非殖民化和地区研究一直是英国学派国际政治研究的两个重点领域，也是其理论构建、发展和完善的重要经验基础，其研究者通过国际社会理论阐述世界历史与国际秩序的演进，认为现代国际秩序是基于共有文化和认同基础上的欧洲国际社会在全球扩展而形成的，为非殖民化和全球南方国家研究提供了独特视角。因而，探究英国学派关于非殖民化研究的观点有助理解全球南方国家与国际秩序的互动，为理解全球南方国家的处境提供宏观的考察视角。

英国学派对非殖民化的关注始于查尔斯·曼宁(C. A. W. Manning)^⑥、

① Karl Hack,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to British Decolonization in Southeast Asia," in Marc Frey e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Decolonization*,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2003, p. 113.

② Andrew W. M. Smith and Chris Jeppesen, *Britain, France and Decolonization of Africa: Future Imperfect?*, London: UCL Press, 2017, p. 2.

③ Rupert Emerson, *From Empire to Nation, the Rise to Assertion of Asian and African Peopl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203-204.

④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1—42页。

⑤ C. Chase-Dunn & R. Rubinson, "Toward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on the World-System," *Politics & Society*, Vol.7, No.4, 1997, pp. 453-476.

⑥ 关于查尔斯·曼宁和英国学派的关系,参见张小明:《查尔斯·曼宁与英国学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期,第73—81页。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和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后经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亚当·沃森(Adam Watson)、巴里·布赞(Barry Buzan)等学者的拓展性研究,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因而,本文所使用的研究资料和文献既包括怀特、布尔、沃森、布赞等英国学派的核心人物著作,也包括伊恩·霍尔(Ian Hall)、安德鲁·赫里尔(Andrew Hurrell)、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等英国学派主要贡献者的论述,还包括如威廉·贝恩(William Bain)、布雷特·鲍登(Breet Bowden)等参与者的文献。^①通过对这些研究者的文献进行归纳和梳理,总结他们关于非殖民化各个层次的观点。他们以“对西方的反抗”(revolt against the West)为出发点,将非殖民化置于国际社会理论中,通过国际规范、首要制度、次要制度等理论工具,探讨非殖民化的各个方面,系统回答了非殖民化和国际秩序变革的关系与影响。

一、非殖民化的进程和动因

英国学派的非殖民化研究植根于国际社会理论,通过对国际社会转变动态的分析,将非殖民化的各个维度展现出来,包括殖民化的界定、非殖民化历史的分期与模式、非殖民化进程的推动因素。

(一) 非殖民化的界定

囿于其理论的特殊性,英国学派对解释性理论的因果过程分析相对较少,而对规范性理论较为关注。因而,英国学派学者极少对“非殖民化”做严格的概念界定,倾向于将非殖民化置于其理论模型中考察。

部分学者将非殖民化置于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历史中,认为非殖民化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分权运动,是国际体系向多极独立一端的一次巨大摆动,同时也是国际社会转型的节点,标志着从西方殖民式国际社会向西方全球性国际社会的转型,认为非殖民化是欧洲国际社会扩大的标志,^②“是在欧洲范围

^① 巴里·布赞将英国学派的研究者分为:核心人物、主要贡献者以及参与者三类。参见 Barry Buzan, *The English School: A Bibliography*, Version of 25 August, 2014.

^② Jacinta O'Hagan, "The Question of Culture," in Alex J. Bellamy,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Its Cr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15.

内把主权从统治者转移到欧洲共和国选民的逻辑和意识的延伸”，^①并且导致了主权国家的扩散和国家间的平等。^②因而，非殖民化构成了外围地区历史发展的主题，同时也使得在1945年以后的冷战两极体系有了另一种体系，即南—北的分裂。

部分学者将非殖民化视为制度和规范扩散、创造与运用的过程，它不仅包括传统交往方式、规范和制度的扩散——也有旧方式、旧规范和旧制度的衰落及消失，同时也是新的交往方式、新规范和新制度创造及运用，^③包括正当性、主权、人权等。因而，非殖民化也可以被视为“一个权利问题，是关于国际政治中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观念的革命”。^④换言之，非殖民化实质上是帝国正当性丧失^⑤和主权国家规范确立的过程。作为正当性的载体，制度与规范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扩散、实践，并增加了新的内容，尤其是对人权的关注，推动了人权从一种思想与观念到成为国际社会一项制度的转变。^⑥此外，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被殖民国家从依附状态转向独立，他们面临能否被西方国家承认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非殖民化国家的承认，标志着帝国制度的衰落和自决被授予成为国家权利和国际正当性的原则。传统欧洲的王朝正当性原则和对独立事实的强调被自决及追求独立权利取代。^⑦

概括而言，英国学派对非殖民化的界定，同其他非殖民化研究者所强调的有相似之处，即“被欧洲人控制的领土和国家获得了独立”。^⑧区别在于，一方面，英国学派将非殖民化置于国际社会扩展的历史中考察，认为非殖民化是国际社会演变的一个节点，寻求对非殖民化更为清晰的定位；另一方面，从理论

① Adam Watson, *The Limits of Independence: Relations between States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 107.

② Barry Buzan, “The Middle East through English School Theory,” in Barry Buzan and Ana Gonzalez-Pelaez,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Middle East: English School Theory at the Regional Level*,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 39.

③ Neta C. Crawford, *Argument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Ethics, Decolonization, and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38.

④ Robert Jackson, “The Weight of Ideas in Decolonization: Normative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Keohane Robert,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32.

⑤ Ian Clark,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61.

⑥ Christian Reus-Smit, *Individual Rights and the Mak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0.

⑦ Mikulas Fabry, *Recognizing States,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States Since 177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48-149.

⑧ Raymond F. Betts, *Decolonization*,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4, p. 111.

的主要工具着手,即国际规范等方面考察非殖民化的细微层面,旨在为非殖民化的起因与影响提供一个解释规范。

这种分析范式的偏好源自于英国学派的理论假设,即现代国际社会是由欧洲国际社会在全球扩展的结果,即“区域国际体系逐渐主导全球”,^①主要演进逻辑是,欧洲国际社会通过殖民扩张演变为西方殖民式国际社会,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非殖民化后,演变为西方主导的全球性国际社会。在这一过程中,欧洲国家长期实践总结和认可的国家间关系原则和制度也随之扩散到全球,它们在英国学派中被称为“首要制度”,反映了国际社会成员的共同认同,包括主权、领土权、均势、战争、外交、国际法和大国管理等;而随着国际社会的扩大,为维系同非欧洲国家间关系而人为设计的政府间安排与组织被称为“次要制度”,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和核不扩散组织等。^②而欧洲国际社会的全球扩展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欧洲使用武力和各种手段征服的国家被纳入欧洲国际社会的“轨道”,遵从欧洲的规则和制度,并建立了一种等级制的中心—边缘的结构关系;另一方面,未被征服的国家也面临施行欧洲“文明标准”^③的压力,随着这一进程的完成,国际社会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因而,在欧洲国际社会的全球扩展和转型过程中,与等级制关系相伴随的是出现了多次的国家独立浪潮,这也就引发了英国学派对非殖民化分期的关注。

(二) 非殖民化的分期与模式

对帝国和国际秩序无政府状态与等级制的关注使英国学派的研究者关注到了非殖民化的分期问题,并立足于国际社会扩展的逻辑和历史进行论述。一方面,强调欧洲国际社会扩展过程中的“我者”“他者”的关系与结构;另一方面,关注国际社会秩序的维系与正义问题。

因而,从微观层面来说,非殖民化意味着非欧洲国家对西方主宰的国际体系的反抗,表现为反抗欧洲殖民帝国,争取国家独立。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沃森认为,历史上存在多次国家独立的浪潮,其中决定性的第一步是美洲殖民地(约1770—1830年)大规模实现政治独立。美国的独立使欧洲对其他海外属地的独立采取了默许甚至是鼓励的态度,导致国家独立浪潮的扩大。19世纪

^① Andrew Hurrell, “Power Transitions, Global Justice, and the Virtues of Pluralism,”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7, No.2, 2013, p. 190.

^② [英]巴里·布赞:《英国学派理论导论》,颜震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版,第16—17页。

^③ 关于“文明标准”的研究,参见 Gerri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末至 20 世纪初,以欧洲殖民国家的属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独立为标志,第二次国家独立的浪潮也逐渐扩散开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动摇了殖民列强维持其殖民地的决心,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抗欧洲海外帝国的非殖民化进程。昆士兰大学教授雷乌斯·斯密特(Christian Reus-Smit)则强调,《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诞生的国家是国家独立的另一波浪潮,且这次浪潮同 19 世纪初拉丁美洲的独立浪潮及 1945 年后的国家独立浪潮对全球化的影响最大。^①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霍尔斯特(K. J. Holsti)倾向于将非殖民化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种现象,但 18 世纪的美国独立则是非殖民化的早期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推动了非殖民化的进展,而印度等国家的独立则将非殖民化推向高潮,至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非殖民化已经结束。^② 这也是历史学家与国际政治学者的主流观点或共识。

牛津大学教授安德鲁·赫里尔提供了一种更为宏观的视角,他将视野投放到了殖民帝国解体和国际社会扩展至全球后,强调非西方世界对非正式帝国与霸权以及国际秩序中不平等和等级制的反抗,表现为争取主权平等、种族平等和经济正义以及文化解放等方面的斗争。在对苏联解体后美国作为帝国和霸权的可能进行分析后,他指出,“只要美国寻求的是一个硬性、排他性的自我利益观,并提出一个狭隘的霸权式秩序观,那么,它有可能导致的结果,不是一个‘美国控制下的和平’,而是一个既对自己又对他人造成不安全感的帝国”。^③ 从这个角度来看,非殖民化也是一个远未结束的进程,这是英国学派同历史和主流国际政治学者的最大差异之处,对去除国际秩序中的等级制的呼吁反映了布尔所关注的秩序和正义的矛盾问题,同时,也是英国学派多元主义价值主张的彰显,即承认国际社会的多元构成,而不是必须建立在一个共同价值体系的基础上。

(三) 非殖民化的起因与推动因素

英国学派认为,非殖民化是伴随着欧洲国际社会的全球扩展而产生,但其他多种因素推动甚至决定了非殖民化的方向。英国学派对非殖民化推动因素的分析展现了其开放性,既关注现实主义的层面,又强调规范性因素的决定性

^① Christian Reus-Smit, *Individual Rights and the Mak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p. 2.

^② Kalevi J. Holsti, *Taming the Sovereigns,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62.

^③ [英]安德鲁·赫里尔:《全球秩序的崩塌与重建》,林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00 页。

作用。

首先,帝国“衰落”导致了非殖民化。尽管英国学派研究者承认帝国的衰落与战争推动了非殖民化,并强调冷战两极体系在推动非殖民化进程方面也发挥了重大作用。^①但在实力之外,起决定作用的是帝国的意图,马丁怀特称之为“西方殖民列强所拥有的政治才能、政治灵活性和良好意愿”,^②其中包括“防止他们与共产主义国家结盟”。^③换言之,非殖民化是帝国的策略转换,从被迫到主动顺应历史潮流。因此,非殖民化被称为“殖民列强的功利主义算盘”“精心策划的利己主义”。

在帝国实力衰落与主动“意愿”之外,帝国内部意识形态的变化,先进或进步主义观念及规范的扩散和运用,也推动了非殖民化。布尔在这个意义上提出“对西方的反抗”,美国——尤其是威尔逊及从罗斯福到肯尼迪的美国领导人——也是从此出发支持非殖民化的。这种意识形态变化,一方面,体现在欧洲国际社会内部,即欧洲对主权、民主和民族主义的渴望,推动了对国家独立限制的反对,到20世纪时,这种意识形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用下进一步推动了反殖民主义;另一方面,这种意识形态反映在各殖民宗主国内部则是其民众对殖民主义的反对。正如布赞所述:“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对内民主与对外殖民之间存在矛盾,宗主国内部的民众反对殖民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涨。法西斯主义使种族主义和任何声称欧洲代表更加优越的‘文明标准’的说辞荣光不再。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权成为反对帝国主义正当性的强大武器”。^④

其次,与先进观念和规范扩散相呼应的是殖民地的反抗和对先进观念的运用,也推动了非殖民化。这些反抗不仅体现在殖民地的革命与斗争上,更重要的是反抗意识的产生。这种反抗意识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地方的抵抗、地方的文化和宗教,以及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⑤布

① [英]亚当·沃森:《国际社会的演进》,周桂银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第329页。

② W. Artuur Lewis, et al., *Attitude to Africa*, Harmondsworth &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51, p. 12.

③ Ioannis Papagaryfallou, *The History Theory Dialect in the Thought of Herbert Butterfield, Marin Wight and E. H. Carr: A Reconceptualisation of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h. D. dissertati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2016, p. 137.

④ [英]巴里·布赞、[英]乔治·劳森:《全球转型:历史、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的形成》,崔顺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87页。

⑤ [加]阿米塔·阿查亚、[英]巴里·布赞:《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刘德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34页。

尔认为,这种意识“始于其精英群体的觉醒”。^① 殖民地的反抗意识集中体现在规范性思想及国家权利等思想,表现之一是作为欧洲优势地位表现的白人种族优越的观念也一去不返,种族平等使非欧洲人相信,他们可以拥有与欧洲人同等的地位,并刺激和鼓舞了非欧洲的文明多样性。^② 反殖民思想的转变部分源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推动了此类思想的进一步传播,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而希特勒的极端民族情绪和种族灭绝的行为直接摧毁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等思想,使自决与独立成为更响亮的呼声。

再次,国际制度与国际组织、国际运动的推动。英国学派强调,国际组织尤其是亚非拉国家推动设立的新机构,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另外是美国主导的联合国附属机构以及大量非政府组织,在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与规范制度化、推动和确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确认自决权和对新国家承认以及疆界的确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在对非殖民化和新独立国家的接纳方面,美国和苏联的作用也远不如联合国。^③ 此外,英国学派还注意到被主流国际关系学界忽视或蔑视的亚非拉地区的运动、论坛,包括亚非会议、亚非团结运动、亚非拉团结运动,包括后期的不结盟运动及“七十七国集团”。英国学派认为它不仅是“国际社会的修正主义联盟”(A Revisionist Alliance),^④ 促进并加强了战后形成的全球规范框架,会议对人权、自决以及不干涉的讨论肯定了非殖民化的成果,推动了非殖民化的进程,^⑤ 并且在万隆会议上第三世界所表达的反殖民主义与和平共处的政治计划,实际上符合国际社会的多元主义概念。^⑥

无论是对非殖民化的界定、分期还是对起因与推动因素的分析,英国学派的研究者都以国际社会的扩展作为其分析的核心,将非殖民化置于一个相对开放的理论体系中,不仅给出了较其他研究更为清晰的“定位”,对非殖民化分期和模式的论述更具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它反映了英国学派的多

① [英]赫德利·布尔、[英]亚当·沃森主编:《国际社会的扩展》,周桂银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2—213页。

② 约翰·文森特:《种族平等》,载[英]赫德利·布尔、[英]亚当·沃森主编:《国际社会的扩展》,第237页。

③ Mikulas Fabry, *Recognizing States,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States Since 1776*, p. 154.

④ James Mayall,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26.

⑤ Andrew Phillips, "Beyond Bandung: the 1955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and Its Legacies for International Ord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0, No.4, 2016, pp. 329-341.

⑥ Richard Devetak, et al., "Bandung 60 Years on: Revolt and Resilience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0, No.4, 2016, pp. 358-373.

元主义主张；另一方面它对国际秩序等级制的反思，将非殖民化延伸到国际秩序中反抗大国霸权的行为，扩展了非殖民化研究的范畴。因而，英国学派的非殖民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其国际社会理论的另一种阐释。

二、非殖民化与国际社会及其理论的变革

非殖民化最直观的结果是国际行为体数量的增加，这种变化带来了一系列国际问题。对非殖民化影响的强调使英国学派有别于其他研究。英国学派认为这种影响是多维度的，在理论层面关注非殖民化的学理意义，强调非殖民化对国际社会的结构、国际规则和制度、国际理论范式的影响；而在现实层面，则强调非殖民化对国际秩序与现实的冲击，主要是失败国家的出现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家治理问题。

（一）国际社会的同一性与多元性

首先，英国学派在非殖民化与国际社会结构上有不同观点。马丁·怀特是英国学派中较早关注到殖民问题的学者，是学派内对非殖民化影响比较担忧的代表，他认为非殖民化削弱了欧洲国际社会。

怀特的担忧来自两个层面：一方面来自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兴起和传播机构的形成。他指出，民族主义的传播推动了被殖民国家的反抗热情，在被殖民的中东国家尤其强烈，“但其手段是暗杀和军火走私、反对现有政府的叛乱、没收外国财产、拒绝协议、解除道德联系”。^①而在非洲，传统部落忠诚、本土文化与建立有效政府之间也难以达成妥协。正是这种混乱，导致怀特称这些“争取解放的运动是虚假的……革命所导致的混乱要远比国际社会本身的缺陷带来的危害更大”。^②这种担忧在20世纪50年代为联合国的活动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所加剧，“联合国既是国际社会衰落的象征，也是其堕落政治上演的舞台”，而“非殖民化和革命学说的传播导致了政府标准的降低，削弱了国际社

^① Martin Wight, "Brutus in Foreign Policy: The Memoirs of Sir Anthony Ede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36, No.3, 1960, pp. 307-308.

^② Martin Wight, "What Confers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a Modern Society?" in Martin Wight and David S. Yo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 276-277.

会”。^①

另一方面,怀特的担忧来自欧洲国际正当性原则的转变及其表现形式的矛盾,这折射了欧洲国际社会的内部问题。怀特将“正当性”定义为:“国际社会对国际大家庭的合法成员资格的集体判断;主权如何转移;当大国分裂成小国或几个国家合并成一个国家时,国家继承应如何管理”。^②从18世纪到20世纪中期,国际正当性由“王朝主义”转向了“民族自决”和“领土完整、多数统治”。原本基于共同历史、文化以及语言而构建的原则也被反殖民统治和确立新的边界而替代,正如怀特所述:“1945年后的反殖民运动否定了欧洲海外帝国的任何法定时效权利”。^③

以布赞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则强调非殖民化推动了国际社会从西方殖民式国际社会向全球性国际社会的转型,并且随着非殖民化速度的加快,深化了全球国际社会的特征。如布赞所述:“1945年至1975年,去殖民化的速度和规模出人意料,将‘西方—殖民’国际社会1.0版转换成‘西方—全球’的全球国际社会1.1版”。^④换言之,非殖民化使得国际社会成员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从表面上看,国际社会的等级性有所降低,其外在表现形式是主权平等的法律与政治关系。因而,非殖民化为南方国家赢得了一定的政治空间。但非殖民化后还带来了东—西分裂和南—北分裂的问题。杰克逊则指出,非殖民化只是将原本存在的分裂放大了,“非殖民化并没有造成几个世纪以来明显存在的南北差距。相反,它将其国际化,就像一个世纪前西方帝国主义将其内化一样”。^⑤

其次,随着独立国家数量的增加,国际体系的频谱朝着多极独立的一端移动,国际社会结构也逐渐松动。与之相对应,国际社会的正当性基础也相应地滑向了多极独立的一端。当国际体系结构处于帝国和霸权的状态时,正当性的维持有赖于对权力的支配。而当非殖民化发生时,国家的独立冲破了原有权力维持的正当性基础,国际体系的多极独立成为现实,而正当性也逐渐转变

^① Ian Hall, *The International Thought of Martin Wigh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p. 129-130.

^②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in Martin Wight and David S. Yo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p. 182.

^③ Ibid., p. 197.

^④ [加]阿米塔·阿查亚、[英]巴里·布赞:《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第135页。

^⑤ Robert H. Jackson, *Quasi-States,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09.

为取代权力的会是什么的问题。因此,沃森认为,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体系来说,维持一定程度的霸权有利于该体系的稳定和国际社会的进程,换言之,“非殖民化产生了一种更便于理解霸权与依附的秩序”。^① 尽管随着非殖民化进程的推进,国际社会的排他性也逐渐减弱,^②但这也意味着国际社会依旧存在着不平等问题。

再次,非殖民化导致了国际社会文化多元化,进而破坏全球国际社会的根基。布赞在马丁·怀特关于“国际社会建立在共同文化的基础上”^③提出了另一个假设,“一个国家的社会由于超越了最初的基础而缺乏共享文化,将是不稳定的”。^④ 这也是布尔在《无政府社会》中提出的核心问题之一:欧洲国际社会向全球范围的扩张是否不可避免地、永久性地削弱了国际社会,使其与无法提供太多文化统一的多元文化世界社会相对抗? 因而,布赞认为,非殖民化打破了文化与国际社会扩展之间的平衡,他的比喻非常形象地指出了这一困境,“对国际社会扩展历史第三阶段的先驱式描述,强调文化差异和对西方的反抗,从而使其将非殖民化理解为建造一座裂开的房子:一个聚合在一起的由局内人和局外人构成的全球帝国秩序,瓦解为一种没有内聚力的全球无序状态,尽管所有人都置身其中,但他们的争吵可能会使房子坍塌”。^⑤ 布尔对非殖民化后的文化多元进行论述,但得出了相对消极的结论。布尔指出,国际社会共存的外交文化,存在于国家的精英阶层,^⑥这造成了国际社会共有文化与国内社会的断层。因而其对国际社会悲观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而宗教的复兴进一步挑战了文化同一性的建设,也被视为是反抗西方的一部分。^⑦

(二) 国际规则和制度维度

从国际规则和制度的维度看,非殖民化推动了国际规范与制度的转折。杰克逊用“全球契约”来形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社会:“规范多元主义、

^① Ian Hall, “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Decolonisation and Its Repercussions in British International Thought, 1945-75,” p. 55.

^② [英]赫德利·布尔、[英]亚当·沃森主编:《国际社会的扩展》,第400页。

^③ Martin Wight, *Systems of States*, New Jersey: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33.

^④ Barry Buzan,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6, No.1, 2010, p. 1.

^⑤ Ibid., p. 8.

^⑥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第266页。

^⑦ Scott M. Thomas, “Taking Religious and Cultural Pluralism Seriously: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9, No.3, 2000, p. 817.

政治反家长主义、国际法和政治伦理是其重要的基础”，^①在这一过程中，非殖民化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首先，非殖民化推动了“主权的普遍化”。^② 主权转变始于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直至苏联解体最终完成。美国政治科学家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在宏观层面观察到非殖民化对威斯特伐利亚式国家主权构建的推动，在英国非殖民化过程中独立的国家符合这一模式，而且这种构建过程存在两组矛盾：新独立国家与原殖民宗主国之间的干涉；20 世纪中期美国和苏联对欧洲以及东欧的干涉问题。因而，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是一种有组织的伪善的例子，它是持久的，但并不一定是约束性的”。^③ 从微观层面来说，非殖民化推动了主权和发展的分离及自决从观念到制度的过程。前者在英国非殖民化过程中得以体现，后者的表现形式则是殖民地的所有人几乎都间接成为国际社会的成员。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威廉·贝恩(William Bain)指出，民族自决的发展和制度化使托管制度“成为一种不可持续的做法”。因而，非殖民化也标志着决定各国社会成员资格的标准发生了历史性变化。^④

其次，非殖民化使自决权和人权飞速发展，摧毁了帝国的正当性基础，而这种破坏作用的“最终结果是国际正当性发生了结构性变化。通过推动强有力的国际人权法典，并将自决权嫁接到这些新兴的规范中，后殖民国家不仅在普遍意义上重申了这一权利，他们还破坏了帝国的规范基础”。^⑤ 但并不是非殖民化推动了人权观念的出现，只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后，关于个人权利的观念与非殖民化的进程结合在一起，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帝国的解体，而非殖民化也推动了人权的制度化。此外，非殖民化使得“文明标准”观念逐渐衰落，并“从政治语言中消失”，^⑥因而，使得西方国家在面临后殖民国家时不得不采

① Robert Jackson, *The Global Covenant, Human Conduct in a World of S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406.

② Barry Buzan, “Universal Sovereignty,” in Tim Dunne and Christian Reus-Smit, *The Glob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237.

③ Stephen D. Krasner, *Sovereignty, Organized Hypocrisy*, Princeton and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01.

④ William Bain, *Between Anarchy and Society: Trusteeship and the Obligations of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32-135.

⑤ Christian Reus-Smit, *Individual Rights and the Mak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p. 153.

⑥ Jacqueline Best, “Civilizing through Transparency: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n Breet Boden and Leonard Seabrooke, *Global Standards of Market Civiliz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136.

用新的规范与准则,如强调市场在规范国家行为中的作用。^①从这个角度看,非殖民化实现了布尔所述的国际正义和个人正义。

再次,在国际制度方面,非殖民化使原本在英国学派中不受重视的次要制度得到了关注,并改变了其形态与结构。沃森指出,非殖民化使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机构有了新的职能,为小国提供了一个可以发出自己声音的论坛,并为各种援助提供集体机制,而越来越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机构。^②联合国大会(以及不断增加的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平等主义主旨足以对国家行为规范产生影响,尤其是在非殖民化、种族平等和世界资源共享等问题上。这种政治话语的转变,提高了第三世界在国际体系中的关注度,但他们在政治、军事和经济能力上的不足同这种在联合国关注度的提高形成了一种“割裂”,进而推动了联合国制度的稳固和改革。^③1945年以后,联合国通过在国际事务中提供“平等的”发言权和投票权,成为成员国相互交往和解决冲突和争端的论坛,同时还围绕国际社会的战争和和平等问题制定了可接受的行动和相互作用的原则。^④

(三) 国际理论范式维度

首先,从国际关系理论来看,非殖民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转折,即“国际关系学科的第二次创立”,促进了边缘国家的国际思想转变。这种转变通过掌握大量政治与学术资源的西化精英群体实现。^⑤这类精英人物的代表如毛泽东、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加纳总理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等,他们不仅在推动其国家的外交行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出于反抗西方现实的需求而构想出的国际思想,如恩克鲁玛对“新殖民主义”理论的贡献,尼赫鲁的“不结盟”和地区组织的思想,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非洲史学家阿里·马兹鲁伊(Ali Mazrui)的“三重遗产”(土著遗

① Barry Hindess, “Civilizing Peoples through State Citizenship and Democracy,” in Breet Boden and Leonard Seabrooke, *Global Standards of Market Civiliz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43.

② Adam Watson, *The Limits of Independence: Relations between States in the Modern World*, p. 61.

③ Mohammed Ayoob, *The Third World Security Predicament: State Making, Regional Conflict,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London and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1995, pp. 72-74.

④ Lacy Pejinovic, *War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 146.

⑤ [加]阿米塔·阿查亚、[英]巴里·布赞:《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第170页。

产、伊斯兰遗产及西方遗产)论断,^①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后殖民主义理论”和“依附理论”的产生,从而使得国际关系学在非殖民化阶段产生了重要转折,美利坚大学教授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和布赞将其称之为“亚洲软国际关系理论,”^②认为这些思想推动了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然而,尽管非殖民化作在这一时期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塑造起到了推动作用,国际关系学界对非殖民化的关注仍然较少,它依旧处于研究的边缘地带。

目前,已有学者认识到这一问题,并开始关注全球南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巴里·布赞和阿查亚提出“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认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来源太狭窄,影响过于根深蒂固,不利于更广泛地了解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世界的研究。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并不是西方的,而是一个开放的领域,期望非西方人士做出贡献”。^③基于此,2014年,他们提出超越西方与非西方二元对立的“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概念,强调重视非西方世界的贡献。^④此后,众多研究者围绕着该议题出版了众多非西方视角的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史论著,^⑤极大推动了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进展。

其次,从帝国角度来看,英国的非殖民化推动了英国国际思想的变化,是英国国际思想转变的关键阶段,格里菲斯大学教授伊恩·霍尔(Ian Hall)将其称之为“思想的非殖民化”(Intellectual Decolonization)。^⑥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英帝国的迅速非殖民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更深入参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转变,使英国对国际政治思考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伴随着帝国的终结,自由国际主义黯然失色,对帝国的维护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巴特菲尔德和沃森关于“对西方的反抗”的论述与激进主义的观点在

① [美]阿里·马兹鲁伊:《深陷困境的非洲:徘徊与新教伦理与韦斯特伐利亚遗产之间》,载[英]赫德利·布尔、[英]亚当·沃森主编:《国际社会的扩展》,第274页。

②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rspectives on and Beyond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 11.

③ Ibid., p. 2.

④ Amitav Acharya,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and Regional Worlds: A New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8, No.4, 2014, pp. 647-659.

⑤ 代表性论著如 Ayse Zarakol, *Before the West: The Rise and Fall of Eastern World Orde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Barry Buzan and Amitav Acharya, *Re-imagin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Orders in the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Indian, Chinese, and Islamic Civiliz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⑥ Ian Hall, *Dilemmas of Decline, British Intellectuals and World Politics, 1945-1975*,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p. 6.

一定程度上不谋而合:帝国的灭亡实际上并没有改变西方与其前殖民地之间的实质性关系。更重要的是,这些关于帝国终结争论的分歧“为英国新兴的国际关系学科在秩序与正义、无政府状态与社会、结构与制度、政治关注与学术超然之间的更广为人知的争论奠定了基础”。^①事实上,这也是对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知识话语霸权的回应。

(四) 国家、地区治理的实践与创新维度

从国际社会现实的角度看,英国学派强调非殖民化对国际社会中的边缘国家和国际秩序的影响。

首先,非殖民化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一批失败国家或脆弱国家。^②非殖民化最直接的后果是使得国际社会的成员数量急剧增加,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非殖民化进程。这种急剧的增长源自于其内聚性的民族主义的驱动,一旦独立实现,其内聚性随之失去凝聚力,这些国家也因此而陷入危机,被跨国冲突、分裂和联系所割裂。^③殖民遗产的保留使得非殖民化后非洲国家构建呈现出一种畸形的发展:“一方面,它们推翻了先前几近原始的、无国家的社会形态,既没有国王,也没有统治者;另一方面,新国家公开希望拥有明确的统治者,正如马克思·韦伯所称的国家‘对物质力量之使用的合法垄断’”。^④因而,“非殖民化给新非洲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和爆炸性风险,传统的部落制与欧洲政治制度格格不入,新推行的思想意识形态非但没有缓和冲突,反而使形势更趋恶化……民族主义所要求的内部团结、封闭独立的国家实体形式经常与欧洲殖民帝国遗留下的现实领土安排之间产生冲突”。^⑤

其次,失败/脆弱国家对国际秩序和国际治理构成挑战,表现为国家内部斗争无法得到有效的控制,并逐渐演变为国际化的战争。从1945年至2014

① Ian Hall, “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Decolonisation and Its Repercussions in British International Thought, 1945-75,” p. 59.

② [英]巴里·布赞:《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闫健、李剑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页。

③ Philip G. Cerny,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Transnational Neopluralism,” in Mathias Albert, Barry Buzan and Michael Zürn, *Bring Sociology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as Differentiation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11.

④ [美]阿里·马兹鲁伊:《深陷困境的非洲:徘徊与新教伦理与威斯特伐利亚遗产之间》,载[英]赫德利·布尔、[英]亚当·沃森主编:《国际社会的扩展》,第279页。

⑤ [英]伊利·凯杜里:《新的国际混乱》,载[英]赫德利·布尔、[英]亚当·沃森主编:《国际社会的扩展》,第335—336页。

年,共发生了195次国家的内部战争,其中69次^①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干预并演化国际化的战争。这些冲击的直接后果便是国际安全问题,正如赫里尔所述:“弱势和不安全国家的存在及其冲突和不稳定会吸引外部力量,一直是传统安全分析家关切的问题,特别是在非殖民化和帝国分裂的四次大浪潮中,每一次都产生了新的、往往是弱势的国家”。^②继而导致的问题是这些国家还是否能被称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国,或者他们可能已经滑向一种被托管的地位,不再是殖民地,而是作为国际社会的附属国。^③

随着苏联解体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而加速了多元化进程,失败或脆弱国家对自身困境和国际秩序中经济、政治地位的不满也印证了布尔的担忧。新一代的英国学派学者的关注点——以布赞和赫里尔等为代表,转移到了国际安全、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等领域。布赞通过一系列著作,提出安全复合体理论,^④以应对非殖民化和后冷战时代国际安全秩序和地区安全的日益复杂化局面,开拓了新的安全研究范式,将地区重新带回到人们关注的视野,同时也提请人们关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前现代史和非国家行为体。而赫里尔则直言不讳地指出,“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具有三重属性:我们需要把握那些人人共享的共同利益;我们需要调节不平等实力;我们需要调和文化多样性和价值冲突”。因而,“全球治理不能被简化为提供国际公共品或解决那些人人都能理解的集体行动问题……任何形式的治理,只要貌似反映了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占全球人口的比重在下降,而且将进一步减少)中优越精英的价值观和偏好,那么,它就有可能面临不可逾越的正当性问题”。^⑤由此而言,英国学派的非殖民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国际社会现实的关切,二者相互印证。

三、英国学派非殖民化研究特点与根源

英国学派较其他非殖民化研究呈现出鲜明的特征和问题。究其根源,这

^① 数据来源:COW数据库, <https://correlatesofwar.org/data-sets/COW-war>, Intra-State War Data (V5.1), 2021年11月11日。

^② Andrew Hurrell, “Security and Inequality,” in Andrew Hurrell and Ngaire Woods, *Inequality,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50.

^③ Barry Buzan, et al.,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London: Lynne Rienner Printer Publishers Inc, 1998, p. 60.

^④ [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忠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⑤ [英]安德鲁·赫里尔:《全球秩序的崩塌与重建》,第10、315页。

种差异本质上是由国际社会理论的研究者共同塑造的。因而,对其非殖民化研究的评估实质上是对国际社会的批判与总结。从该角度而言,英国学派的非殖民化研究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通过非殖民化研究探索非西方世界同国际秩序之间的互动,追溯一些国际社会现实问题的历史根源,如失败国家和脆弱国家、国际安全、政府治理等;二是对英国学派及其思想进行反思与批判。

(一) 英国学派非殖民化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因其独特的理论特征,英国学派的非殖民化研究具有的优势如下:

第一,宏大的整体叙事与研究时段和内容的全面性。其宏大的整体叙事体现在,通过对西方国际社会在全球扩展的论述,对非殖民化给出相对精准的定位,考察非殖民化推动因素,强调非殖民化对世界历史和国际现实和理论的影响。这种路径使其研究有着天然的宏观视角,能够较为直接地观察帝国与殖民地和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尽管也有其他学者从宏观理论体系论述了非殖民化,如世界体系论者将非殖民化置于世界经济体系中考察,认为非殖民化是世界体系扩张与收缩的产物。^①但他们仅仅将非殖民化视为一种产物,对其影响与过程并未做深入探究。

其研究时段与内容的全面性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在非殖民化的起止点上,部分学者将非殖民化的起止点定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与中国香港的回归,^②也有学者将其定位在1905年日俄战争与20世纪60年代。^③而英国学派将非殖民化追溯至美国独立和苏联解体,突破了其他学者非殖民化研究的界限,从而使英国学派视野中的非殖民化既具备宏观的整体叙事,又具备了连贯性;另一方面,英国学派对非殖民化的关注,不仅在于国家独立层面,对国家独立之外的探索更丰富了其研究的内容。以布尔为例,他将“西方的反抗”分为五个层面,即争取独立的非殖民化和帝国的终结、争取主权平等、争取种族平等、争取经济公正和争取文化解放,这些议题至今仍被学者所关注。

第二,强烈的现实指向性与理论指导意义。不同于历史学者的非殖民化研究,英国学派的非殖民化研究强调其影响。如果说他们从理论层面强调对

^①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孙立田等译:《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扩张的第二个年代 18世纪30年代—19世纪40年代》,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275、329页。

^② Raymond F. Betts, *Decolonization Second Edition*, pp. 1-2.

^③ Prasenjit Duara, *Decolonization: Perspectives from Now and Then*, London: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4, pp. 1-2.

国际社会、国际规范和共有文化的影响是为了使其理论更为完整的话,那么,对国际秩序中的正义、失败国家,以及政府治理的关注则使其研究更贴近国际政治的现实。其研究者对第三世界经济斗争、国际安全问题、伊斯兰世界,以及政府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分析,均对非殖民化导致的国际政治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非殖民化的研究。布赞、阿查亚等学者还将非殖民化与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联系到一起,一方面,强调非殖民化对非西方国际关系学科的构建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关注到非殖民化对宗主国国际思想和国际关系学科构建的影响,这是其他非殖民化研究所忽视的,更彰显了英国学派非殖民化研究的现实和理论指导意义。

英国学派的非殖民化研究也呈现出如下不足:第一,明显的西方中心倾向。受帝国研究的影响,目前的部分非殖民化研究呈现出一种较为明显的西方中心叙事方式,英国学派也不例外。一方面,英国学派对国际社会扩展过程中一些事实的刻意回避,如军事扩张、殖民征服、经济剥削等,造成了其传统叙事中的西方中心倾向和对非西方国家的边缘化处理。而在非殖民化的研究中,这种忽视并没有缓解,认为非殖民化是西方国家的主动选择,对西方实力衰落和非西方国家的反抗也没有进行细致分析;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同一性文化缺失和削弱的担忧,则凸显了其国际社会源自于单一文化的假设;而且认为非殖民化在本质上并没有改变西方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① 另一方面,英国学派将非殖民化视为一个单向过程,强调非殖民化对国际社会的冲击。这一点体现在对冷战后国际社会的看法中,认为“后殖民时期是一个融合和引进的时期,是一个单一的国际秩序,由西方主导的国家形式和西方主导的规则、习俗和习惯组成……国际社会是一种真实的历史社会形态,它没有被后殖民过程所取代,而是被后殖民过程所传播”。^② 而较少从后殖民国家的社会层面探究对国际社会造成冲击的原因,从而使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脱钩。布尔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但却得出了悲观的结论,他认为尽管非殖民化使得非西方国家建立了类似的政体,但“对西方政治形式的吸收只是表面的或修辞的,是传统文化态度决定了政治行为,而不是从西方引进的思想和态度,西方和第三世界之间深刻的文化鸿沟将永远不利于一个真正全球化的国际社

^① Ian Hall, “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Decolonisation and Its Repercussions in British International Thought, 1945-75,” pp. 54-55.

^② B. A. Roberson, “Law, Power and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Cornelia Navari, *Theoris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English School Methods*,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 189.

会的出现”。^①因而,英国学派的这种研究路径,事实上在无意间再次将非西方国家边缘化。

第二,对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忽视。从历史学角度探索非殖民化的研究者对解密档案的运用,使其研究较为完整的反映了非殖民化的历史进程。而且,他们对非殖民化的分析,不仅仅着眼于帝国实力的变化,民族主义、精英群体、国际组织等因素都成为其分析的工具。对比来说,英国学派则更关注非殖民化的影响,强调非殖民化对国际社会造成的冲击,并且认为这种冲击在一定程度上负面的,深刻影响着战后国际社会的稳定,极少详细论述某一国家非殖民化的历史。此外,英国学派对非殖民化成因的分析,过分强调规范性因素的作用,对现实主义因素较少做细致分析,也较少论述精英群体的作用,其研究也因缺乏历史的细节而略显单薄。

(二) 英国学派非殖民化研究特点的来源

英国学派非殖民化研究的特点,从根本上说是其研究者长期以来的研究风格和研究主题共同塑造的。

首先,英国学派的国家中心倾向与无政府假设。牛津大学教授爱德华·基恩(Edward Keene)指出,英国学派的分析致力于国家层面,强调由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也关注在国家研究中所创造出的社会概念,并用于规范国家间的行为。^②但英国学派关注国家普遍行为的同时,也对大国保持了独特的关注。^③这种倾向在沃森那里甚至得到很坦率的回答:“英国委员会一开始就带有以国家为中心的偏见,并专注于赫德利·布尔所认为的国际关系多元化方法”。^④布尔则肯定了国家中心的假设,认为现存的强调超越“国家体系”的说法站不住脚,最重要的理由是,“在西方,那些蔑视国家体系的人低估了西方国家自身在保护和发展国家体系中所拥有的特殊利益”。^⑤这种观点强调了西方在塑造

^① Andrew Hurrell, "Society and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B. A. Roberson,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2, p. 23.

^② Edward Keene, *Beyond the Anarchical Society: Grotius, Colonialism and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2-13.

^③ Paul Keal, *European Conquest and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The Moral Backwardnes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30.

^④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Series Editors' Preface," in Adam Watson, *Hegemony &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xii.

^⑤ Hedley Bull, "The State's Positive Role in World Affairs," *Daedalus*, Vol.108, No.4, The State, 1979, p. 120.

国家和国际体系的过程中的主导性,也就产生了布尔所说的,第三世界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对国际体系的依赖性。因而,国家中心的倾向是对国际社会起源的回答,这也导致了英国学派认为在历史上发生了多次非殖民化进程。

这种国家中心观,使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忽视了扩展叙事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对个人和次国家行为体的忽视与否认。^①正是因此,出现了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断层,体现在非殖民化研究中则是对次国家行为体作用的相对忽视,进而导致其非殖民化研究细节的缺失。但这种国家中心观所带来的是其关注主体的明确性,加之英国学派对历史的强调,使其不仅关注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家独立,还对不同时期殖民地独立的事件给予了关注,非殖民化也因而有了连贯性。

其次,对国际秩序的强调和国际秩序源自于欧洲国际社会全球扩展的坚持。如果无政府假设是其理论前提,国家是主要行为体,那么,“国际社会”便成为其主要的理论工具,“秩序”则是其理论的“终点”,它们共同构成了英国学派理论的整体。英国学派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这种社会性分析,对国际政治有一个较为系统和完整的认知,如布赞所述:“英国学派意图在国家层次之外创造些许秩序与正义的社会辩证法”。^②这种理论路径,决定了英国学派对衍生于欧洲国际社会全球扩展所创造的秩序及其正当性有着较为集中的关注:“即使英国学派的文本批判西方的政策并同情后殖民反抗……它们通常也表现出对国际社会秩序更保守的关注”。^③因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时代背景下,英国学派继续保持对非殖民化的关注,马丁·怀特的奠基之作是关于殖民地宪法的研究,亚当·沃森曾担任英国外交部非洲司司长一职,20世纪70年代,赫德利·布尔也在印度度过了一段休假生活,这些经历深深地影响了他们反抗西方的思想。^④

由此来说,英国学派对非殖民化的关注则源自于对西方所构建的国际秩序的担忧,因而,正如布尔和沃森等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文化碎片化表示一定程度的悲观,而维也纳国际大学副教授里默尔(Andrea K. Riem-

^① Paul Keal, *European Conquest and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The Moral Backwardnes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p. 36.

^② [英]巴里·布赞:《英国学派理论导论》,第26页。

^③ Roger Epp, “The English School on Frontier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im Dunne, et al., eds., *The Eighty Years' Cris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19-199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58.

^④ Christian Reus-Smit, *On Cultural Diversity: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World of Differ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84.

er)和斯蒂维奇蒂斯(Yannis Stivachtis)指出,“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运行的逻辑,将(新)国家纳入国际体系后,文化的逻辑将决定它们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①因而,他们认为非殖民化和两个超级大国的对峙进一步弱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社会。

总体而言,英国学派的理论构建方式与特征为其非殖民化研究预留了空间,即一个开放、没有最高权威的国际社会,如何看待成员数量的增减与维系、成员如何被接纳、同质性规范/文化如何塑造、国际社会的秩序将走向何处。因而也可以说英国学派的非殖民化研究实质上是对国际社会学理论的一种具象化论述,尽管并非其理论的全部,但较为清晰地展示了国际社会与国家这种行为体的互动,揭示了其理论的逻辑。

结 语

英国学派的非殖民化研究基于国际社会理论展开,其理论逻辑与构建方式决定了非殖民化研究较为明显的优缺点。这种理论方法使英国学派的非殖民化研究事实上陷入了一种中心—边缘的矛盾之中。

首先,英国学派的理论构建方式决定了他们对非殖民化研究的方法与观点,通过关注非殖民化的分期与模式、推动因素及影响的多维度,将非西方置于国际社会的理论中考察,从而为理解非西方世界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支撑。尤其是对非殖民化影响的关注,对失败国家的出现,苏联解体和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国际治理困境的担忧都暗合了21世纪国际秩序的危机。在这种背景下,非殖民化也意味着反抗国际关系中的不平等和等级制,即实现国际社会和个人的正义。而非殖民所导致的国际社会文化多元化和对非西方世界国际关系理论的推动也与当今国际关系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去中心化趋势不谋而合,如赫里尔所指出的,“虽然西方和英语在国际关系知识生产中的主导地位仍然重要,但它并不能掩盖世界上正在发生作用的权力、等级制度和不平等模式的变化”。^②对此,加拿大政治学家T. V. 保罗(T. V. Paul)指出,要呼吁承认非西方国家的历史、社会与文化和思想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关注这些国家本土的

^① Andrea K. Riemer and Yannis Stivachtis, *Understanding EU's Mediterranean Enlargement: The English School and the Expansion of Regional International Societies*, Frankfurt: Peter Lang, 2002, p. 27.

^② Andrew Hurrell, “Beyond Critique: How to Study Global IR?”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8, No.1, 2016, p. 150.

施动性,并使共存的文明理念融入主权国际体系,弥合理论范式的缺陷。^①

其次,英国学派的非殖民化研究依旧没能摆脱其理论假设中的西方中心倾向。英国学派在假定国际社会源自于欧洲国际社会全球扩展的基础上,坚持无政府假设、国家中心倾向导致了英国学派在强调国际规范的同时,不可避免的滑入了两个极端即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正是因此,使英国学派的非殖民化研究缺少历史的细节,也少了对非西方国家内部的关注,因而也就无法理解这些国家在国际秩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它们在独立后国家困境的来源,而将其简单归因为非殖民化。这种研究对象和视角与观点之间的张力,是英国学派非殖民化研究最显著的特征:在强调国际秩序西方起源的同时,也希望关注国际秩序中的正义和平等问题,这也是英国学派理论的巨大缺陷。而修正这种缺陷既需要西方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研究者抛开固有成见,也需要全球南方国家研究者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主动构建。此外,还需要对起源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效批判和对非西方世界本土文化与思想的有效发掘与利用。

最后,应当看到,沿着国际社会演进的逻辑去思考非殖民化的进程,的确为非西方世界与国际秩序间的互动构建了有效的联系。但在当今日益分化和联系更为紧密的世界中,这种理论逻辑同现实的脱节也越发明显,尤其在经济、种族不平等问题上的争议越多越多,要实现布尔所谓的全球正义,需要对英国学派的理论也需要做更多的批判与反思。巴里·布赞在这方面开创了新的研究范式,在其新作《塑造全球社会》中,布赞提出了一种新方法,使国际关系成为一门超越欧洲中心论和比较文明的真正全球性学科。他讲述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跨越三个时代的故事,利用其物质条件和社会结构来展示全球社会是如何演变的。该书运用英国学派关于首要制度的观点,将其故事设置为三个领域:跨界、跨国和跨人类,展示了人类故事的鲜活历史感,同时避免了许多社会科学宏大理论的过度抽象。布赞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即人类历史上的三个主要时代被动荡的转型期分隔开来。这一方法从根本上重述了现代性是如何从18世纪晚期兴起的,展示了全球社会的概念如何能够架起连接国际关系、全球历史社会学和全球/世界历史的桥梁。^②

^① T. V. Paul, "Building an Eclectic and Inclusive Global IR: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21st Century," *Ind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2, No.13, 2022, pp. 38-45.

^② Barry Buzan, *Making Global Society: A Study of Humankind across Three Er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